

「探求者」

在巨流中 擺 渡：

的

文學
道路

與

創作
困境

黃文倩 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在巨流中擺渡

「探求者」的文學道路與創作困境

黃文倩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在巨流中擺渡：「探求者」的文學道路與創作困境

/ 黃文倩作, -- 初版, -- 臺北市：師大--；新

北市：Airiti Press, 2012. 01

面； 公分

ISBN 978-957-752-650-2 (平裝)

1.中國文學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20.7

101000581

在巨流中擺渡：「探求者」的文學道路與創作困境

作者／黃文倩

發行人／張國恩

總編輯／陳昭珍

主編／古曉凌

執行編輯／宋亦勤、方文凌、林冠吟、陳靜儀

封面設計／石怡蔚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Airiti Press Inc.

編輯委員會／王震哲、李振明、李通藝、周愚文、林東泰、洪欽銘、許瑞坤、

陳文華、陳麗桂、劉有德、潘朝陽

發行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電話：(02)7734-5289 傳真：(02)2393-7135

服務信箱：libpress@deps.ntnu.edu.tw

Airiti Press Inc.

234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話：(02)2926-6006 傳真：(02)2231-771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法律顧問／立暘法律事務所 歐宇倫律師

ISBN／978-957-752-650-2

出版日期／2012 年 1 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 450 元

本書撰寫期間曾榮獲

行政院陸委會中華發展基金獎勵研究生赴大陸研究獎勵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博士論文獎

(國科會編號 : NSC 97-2420-H-032-001-DR)

謹此致謝

序

呂正惠

文倩的博士論文經過修改，即將出版，問我要不要寫篇序。這篇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當代大陸作家陸文夫和高曉聲，都是我很喜歡的小說家。我跟他們兩人有一面之緣，雖然兩人都已過世，至今有時還會想起他們。為了表示懷念，我還是撥出時間來寫比較好。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由於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引起的轟動效應，當代大陸小說開始輸入台灣，新地出版社的老闆郭楓先生是主要的推動者之一。我很幸運的認識了他，從他那裡看到一些尚未在台灣出版的作品。後來這些作品也陸續出版了，我還為其中一個系列寫了一篇短序，這個系列包括汪曾祺、從維熙、高曉聲、陸文夫等老右派作家。我在序裡說，這一批老右派，可能是從五四運動以後開始興起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最後一代。那時候我已經感覺到，大陸文壇正在求新求變，過去的現實主義已經不再被下一代的知青作家所喜愛了，後來的發展證實了我的看法，但是我沒想到，這一批老右派作家，除了王蒙之外，到九〇年代就幾乎完全被遺忘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隨著郭楓先生，還有幾位朋友，到大陸去繞了一趟。這是我第一次到大陸，走了北京、成都、重慶、三峽、武漢、上海、蘇州、杭州，真是走了不少地方。我在蘇州見到陸文夫和高曉聲，吃完晚飯、喝完酒後，別人都休息了，我到高曉聲的房間聊天。高曉聲的常州話，我只能聽懂三成，但我們竟然聊到天亮。天亮後，高曉聲拎著簡單的行李就走了，一九九九年他去世，七十一歲。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高曉聲。可是在本世紀之初，我跟陳映真先生到蘇州去，當時身為江蘇作協主席的陸文夫出面跟我們照團體照，我根

高興又再度見到他，他還記得我，我問他，出不出高曉聲的文集，他說：會的。又隔了一、兩年，我在北京，全國作協開大會，我參加了閉幕式。閉幕式上特別介紹幾位即將退休的全國作協副主席，其中就有陸文夫。散會後，我很想走向前去跟他打招呼，但他很落寞的走著，跟誰都不講話，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說什麼，就跟別人走了。沒想到過不了多久，就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是在二〇〇五年，七十七歲。經過幾年的等待，我既沒有買到《高曉聲文集》，也沒有買到《陸文夫文集》。以他們兩個在大陸文壇的地位，即使已經到了被遺忘的邊緣，也不能不出他們的文集。我一直不甘心，還是癡癡的等下去。

我這個多年的心願，沒想到是文倩幫我完成的。文倩碩士論文寫的是莫言，後來她考上淡江博士班，上我的課，突然喜歡起陸文夫和高曉聲，真是令人意外。她決定以“探求者”集團為研究對象。一九五七年，高曉聲、陸文夫和幾個朋友，為了打破當時千人一面的文壇現象，準備辦同人刊物《探求者》，想要為中國文壇創造一個流派。不久，反右之風括起，他們全部被打成了“反黨集團”，全部成了右派分子，從此落難二十年。文倩想要從一九五〇年代以來中國文壇的氣候變化，來研究“探求者”集團的命運變遷；其中主要分析，高曉聲、陸文夫在五〇年代突然崛起、又被迅速打壓下去的過程及其原因；還要探討他們兩人在八〇年代初期再度竄紅、經過幾年紅得發紫、在九〇年代又逐漸被遺忘的歷程。我認為文倩野心太大，這樣的題目超過她的掌握能力，並不加以鼓勵。但她充滿自信，躍躍欲試，我也不好阻攔。

我跟她說，按我對大陸體制的了解，不可能不出兩個人的文集，看她能不能找找看。沒想到她神通廣大，居然把兩套文集都挖出來了。她說，《高曉聲文集》印出來後，就堆在江蘇作協的倉庫裡，根本沒上市。《陸文夫文集》是怎麼找到的，我已忘記了。總之，兩人

死後已全被遺忘，文集沒人有興趣，居然擺不到書店裡。我沒想到，大陸變化的速度有這麼快，十年前還名滿天下的大作家，如今居然已無人問津了。

其後，文倩把兩人的年表，以及兩人的作品目錄都編出來了，到這個時候，我才對她的論文有信心。以我的經驗，台灣的研究生要做當代大陸文學，第一個困難的就是資料，我認為，文倩應付起來毫無困難。我跟她說，下一步的工作是要熟悉大陸社會，這只有多跑大陸，多跟大陸專家接觸才能解決。文倩的勤快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後來我碰到大陸當代文學專家，他們往往跟我提起文倩。不管怎麼說，我不可能再對文倩提出任何要求了。

高曉聲和陸文夫的命運，其實是和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密不可分的。台灣學者要研究大陸當代文學，如果對這段歷史不能深入其中，所有的研究只能流於浮面。現在文倩已經了解這個道理，但我不能說，她這本論文的分析都一定到位。每個人對歷史的理解，都需要一個過程。以我個人來說，從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次到大陸，到現在已經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我絕對不敢說，我已經完全了解新中國的變化過程。我們比較不幸，跟大陸隔絕了快四十年，又被台灣和西方的宣傳洗腦了四十年，如果還選擇研究當代中國，那只能靠不斷的努力，不斷的自我提升，不然就是浪費時間與生命。至少我覺得，文倩已經走到正確的道路與方向，這是相當可喜的。

文倩這幾年的努力，還有她已成形的論文，讓我想起我接觸當代大陸文學的過程，特別是讓我能夠重溫舊夢，想起我對陸文夫和高曉聲的喜愛，而且因此也得到他們幾乎所有的作品，對我來講，也是很有紀念意義的。

2011/9/30

引言一：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災人。災人者，人必反災之。——莊子《內篇·人間世》

引言二：

生活與藝術，不僅應該相互承擔責任，還要相互承擔過失。詩人必須明白，生活庸俗而平淡，是他的詩之過失；而生活之人則應知道，藝術徒勞無功，過失在於他對生活課題缺乏嚴格的要求和認真的態度。——巴赫金〈藝術與責任〉¹

存在作為屬於人（與人相關聯）的一切，其價值的多樣性只展現給懷著愛心的直觀，只有珍愛才能把握和鞏固這種多樣性。……來在每一個事物身上緊張地放慢、加強、雕琢它的每一細節。只有愛心才能在審美上成為能動的力量。——巴赫金〈論行為哲學〉²

① 收入巴赫金原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2。

② 同上注，頁63—64。

目次

序	I
第一章 緒論：為了忘卻的紀念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研究方法	7
第三節：文獻評述	10
第四節：章節重點	19
第二章 啟蒙者與被改造者——「探求者」雙重姿態的發生	25
第三章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條化的發生與回應：1949-1957年 「探求者」公共視野的起源與文學創作	35
第一節：五〇年代「探求者」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的接 受與窄化	35
第二節：「雙百」運動前「探求者」的小說——與人民立場融合的感性 實驗及其縫隙	49
第三節：「雙百」運動、新中國社會問題跟「探求者」創刊的關係	62
第四節：「雙百」運動期間「探求者」小說的特性：基層知識份子跟共 產黨政權的矛盾現象	74
第四章 雙重姿態下的公共視野：1978-1984年「探求者」的世界 觀與小說	95
第一節：「探求者」世界觀的擴展及思維局限	96
第二節：建國後社會生活與人物命運的公共視野——論高曉聲小說 (1978-1984)	113
一、新中國的農村生活、農民性格與風格的「變化歷程」——論1984年前的 「陳奂生」系列及〈極其簡單的故事〉與〈極其麻煩的故事〉	116

二、知識份子的自我安慰、文革的「世代」反思、社會主義的教育連繫——論〈周華英求職〉、〈系心帶〉、〈特別標記〉、〈定鳳珠〉與〈我的兩位鄰居〉	127
三、農村婦女與工人階級的愛情與婚姻關係——論〈揀珍珠〉與〈跌跤姻緣〉	137
四、「世代」視野下農村現代化與社會主義淵源的再聯繫——論〈水東流〉與〈蜂花〉	143
五、農民、幹部、知識份子的精神病症——論〈錢包〉、〈山中〉、〈太平無事〉、〈魚釣〉及〈繩子〉	148
第三節：新時期意識型態下的社會反思、社會主義理想與文士性情——論陸文夫小說（1978—1984）	155
一、新時期意識型態下的官僚與教育反思——論〈特別法庭〉、〈門鈴〉、〈圍牆〉與〈唐巧娣翻身〉	156
二、科學、日常、商業、飲食文化中的社會主義理想、矛盾與文士性情——論〈獻身〉、〈小販世家〉、〈還債〉與〈美食家〉	167
第四節：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中的路線之爭及其問題——論方之小說（1962—1979）	186
一、基層黨員方之及其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認識——論〈出山〉與〈看瓜人〉的「革命路線」問題	189
二、論〈內奸〉對共產黨革命史的橫切面重構——兼論其說書立場的實踐意義	195
第五章 雙重姿態下文學面貌的窄化：「探求者」1985年後的小說	203
第一節：社會意識固著化、歷史性質抽象化與情感的個人性窄化——論高曉聲1985年以後的小說	206
一、農村與經濟「現代化」轉型問題及其新保守態度——論〈送田〉與〈美國經驗〉	208

二、文革歷史清理的政治困境與寓言困境——論〈回聲〉與〈觸雷〉	215
三、「歸來」知識份子的「生活」危機與自我安頓的矛盾——論〈臨近終點站〉、《青天在上》、《天意》	223
四、中美現代化參照、反省與思考的定型——論〈災難古龍鎮〉、〈戰術〉及〈陳奐生出國〉	237
 第二節：感情的文人化與社會主義理想的非辯證性解構——論陸文夫 1985年以後的小說	244
一、孤立的「美」與五四啟蒙話語的再連繫及其限制——論《臨街的窗》、 《井》與《人之窩》	246
二、社會主義日常生活懷舊及其非辯證性解構——論《畢業了》、《清高》 與《享福》	262
 第六章 結論：面對失落的公共視野	277
 主要參考文獻	283
一、文學作品	283
二、批評與研究專著	289
三、期刊、報刊文獻及學位論文等	297
 附錄一：「探求者」作家小說或創作年表	305
 附錄二：高曉聲與陸文夫的重要生活年表	318

第一章 緒論：為了忘卻的紀念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探求者」是中國大陸「雙百」期間（1956－1957年）出現的一個同人刊物與作家群的總稱。在刊物的草創過程中，曾寫有一些彰顯其文藝理念的文章，包括：〈意見與希望〉、〈探求者月刊社啟示〉、〈探求者月刊社章程〉，同時，亦有不同於五〇年代「一體化」狀態下的文學創作。然而，刊物尚未正式出版，就因為1957年中的「反右運動」而被迫中止。當年主要參與的作家，包括葉至誠（1926－1992年）、高曉聲（1928－1999年）、陸文夫（1928－2005年）、方之（1930－1979年）及陳椿年等人，也因此被劃為「右派」³或所謂的「反黨集團」，真誠地步入再「改造」的一生。改革開放後，這一批作家中的高曉聲、陸文夫和方之，再度成為八〇年代的重要代表作家，備受矚目。由於其文學淵源、創作題材、藝術手法、現實視野，跟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毛澤東在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啟的延安文學新傳統密切相關，不但反映了早年部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與實踐、農村或工廠的下放「改造」經驗，也見證與記錄了新中國建國前後到改革開放的各式社會與歷史流變，所以他們的一生經驗與文學作品，既是理解中國大陸「右派」作家（或「歸來」、「復出」作家）的重要個案，也是歷史性的認識新中國建國前後及其日後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發展

³ 本書所討論到「右派」作家的內涵，並非訴諸一般抽象政治學意義上的「左派」、「右派」的概念，而是特指在新中國的歷史語境下，於1957年中的「反右運動」下，被共產黨打成「右派」或受到這項政治運動牽連、審查的「青年作家」，用另一種時空條件來界定，乃指的就是在改革開放後，被文學史命名為「歸來」、「復出」作家的這批人物。他們的立場、精神或意識型態，事實上仍是隨著各階段歷史條件的不同，而有所細微差異，故本書難以抽象地界定他們，但本書基本上認為，這批「右派」作家，其實一生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左翼關懷社會的傾向。

的一種媒介。而兼以文學史的視野來理解本個案，將「探求者」的文學現象與作品生產，放入世界冷戰格局的背景下來認知，也是清理進而建構第三世界國家的困境與文學主體性的一個有機部分。有鑑於臺灣學界長期對此領域的陌生，上述的各種論述功能／意義也就亦有過渡性的必要。

然而，儘管這是稍有大陸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知識，也不難開發出來的研究對象、問題意識與思考方式，但可能基於某些政治原因，在我經過相關的文獻考察（詳見後），卻發現海峽兩岸的大陸當代文學研究，仍以十七年時期的「紅色經典」與改革開放後的「知青」世代的作家作品研究，較受到嚴肅的對待與處理。雖然仍有一些對「右派」作家（在本書的界定範圍內的指涉）的創作歷程及其作品的個案分析，但並不令人意外地，1978年以前的分析文獻，多使用較單一、線性的思維，並慣性地概括成一種政治意識／思想型態的論述（這當然是在臺筆者的階段性認識）。改革開放後的研究概況，又多採用五四啟蒙視野的標準，來進行文本主題或藝術分析，難免簡化了新中國與社會主義革命與發展下的歷史生產的獨特性與複雜性。在作家、作品的基礎文獻／史料的整理上，除了王蒙及汪曾祺外，大部分的「右派」作家的相關研究，也沒有為他們編撰基本的著作年表與生活年譜，採用「先驗」觀念與研究者的「期待視域」的分析相當普遍，因此其主題、題材、人物內涵、「獨立」式的藝術技巧賞析，許多幾乎不出既定的認識框架（如納入所謂的傷痕、反思、改革的套路，或人性、人道的普世性詮釋）。八〇年代末以後，中國大陸研究現當代文學較重要的論者／批評家們，又因為許多國內外政經等複雜因素⁴，紛紛將文學研究的重點，移轉到所謂的「文化研究」和高度思想性質的傾向，使得

④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見賀照田〈後社會主義的歷史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變遷〉，收錄《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54—75。

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更多地傾向成為解剖意識型態、檢討歷史思想、回應中國當代問題的實用功利工具，雖然這樣的研究方式有其「先進／進步」的重要意義（從左翼文學所重視的解放意識形態與社會實踐的功能與作用來說），在本書中，我也部分地吸收了這種視野與方法，但是，我們仍必須自覺，思想性質的文學研究，一旦過於固定、坐實或排它，也會跟過於講究「藝術」一樣，其進步意義也會走向其反面。在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研究／批評的目的之一，在追求社會介入／實踐解放的思想／意識的目的間，仍需綜合與擴充對「文學本身」⁵的複雜與具體的分析。例如，分析作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題材選擇、想像、才能、文體、語言，以及跟古今中外文學典律、淵源間的繼承關係、實用性與無目的間的歷史「辯證」性質等等。畢竟，若僅僅將文學材料作為從事現當代文化與思想研究的媒介，那麼為何不平行地參照與研究同階段的哲學家、批評家、社會學家、理論家、政治家的思想？某種程度上，他們不是可能比文學家的思想或意識型態，更富有歷史與社會的解放意義的豐富性嗎？因此，綜合上面的考慮，以及截至本書草稿出爐（2011年秋）為止，本書對「右派」作家及作品研究成果的理解，是以廣泛的「右派」作家的文學作品的認識為基礎，並聚焦在「探求者」作家群的作品淵源、內涵、藝術、風格、甚至文體實踐，跟二十世紀其獨特的歷史、社會、政治間的關係，進而評述其在冷戰背景下的第三世界國家文學的意義豐富性與文學困境，就我所知，尚未有學者將其有系統地清理與重構，因而是一件值得嘗試的工作。

相較於其他當年也曾被打成「右派」的「干預現實」的小說家，如鄧友梅（1931年－）、從維熙（1933年－）、王蒙（1934年－）、張賢亮（1936年－）等知名的個案，或同階段並未被打

⁵ 此處的「文學本身」的使用，並「非」將它視為一種「獨立」的客體看待，也並非直接使用中國大陸八〇年代中以降的「獨立式」的「文學本身」的指涉。我主張它是一種在歷史動態發展中，可辯證式地融合思想性與技術性的文學實踐。

成「右派」的女作家，如茹志鵝（1925－1998年）、宗璞（1928年－）等，或文人小說家汪曾祺（1920－1997年），「探求者」作家群，可能是類似於戈德曼所言的「某些突出的個人」的一種。呂西安·戈德曼在《隱蔽的上帝》中說：「人與人的覺悟程度各不相同，只有某些突出的個人或處在某種特別適當的形勢下（如戰爭形勢下的民族意識，革命形勢下的階級意識等等）的群體大多數成員才能達到最高度的覺悟。由此而產生突出的個人比群體的其他成員能更好地、更確切地表達集體意識的情況。」⁶除卻他們是五〇年代少數文藝同人團體的代表外，跟當年其他被打成「右派」的小說家相比，他們在「雙百」期間，雖然也都企圖「探求」與「干預現實」，但由於葉至誠出身五四作家葉聖陶之家，使得他們在文學「探求」的觀念上，具有對五四時期文學流派百花齊放的淵源的自覺（儘管很簡化）；在其「探求」的世界觀與實踐上，雖然確實繼承了一定程度的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降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文藝傳統，但從其作品內，也同時存在著魯迅精神、十九世紀俄國傳統下的批判現實主義、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白話小說傳統等淵源。這些文學淵源跟中國當代文學關係，在「大框架」上，在今天大陸當代文學史上，已被眾學者所認識與承認⁷。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當中的「細節」與「差異性」，或說更精細的存在感（而非「共相」式的框架分析）。換另一種說法就是：「探求者」作家群跟上述文學淵源的「接受」內涵與認識水準，和他們的創作姿態、各階段政治與生命等的關係。這些世界觀與文學實踐，是一種能夠理解新中國建國後文學淵源、發展與歷史困境的重要進路。例如，以高曉聲早期的作品實踐來說，他在1957年的〈不幸〉中，就明顯跟契訶夫的批

⁶ 呂西安·戈德曼《隱蔽的上帝》，（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22。

⁷ 可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及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

判現實主義的戲劇〈萬尼亞舅舅〉有互文關係，顯示出他早期不自覺地，偏向批判現實主義風格，傾向五四時期啟蒙立場的知識份子的姿態，明顯地跟建國後的知識份子，乃是作為一個被改造的對象與姿態間的矛盾；而方之在新中國建國到反右前，雖然極真誠也積極地投入中國底層農村改革，並具體地實踐出一些短篇作品，也頗受蕭洛霍夫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式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毛「講話」以降，以及趙樹理四〇年代小說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發現主題等世界觀等的影響，但他也仍在「雙百」中受到極左的政治力量打擊。如何具體地解釋，他們的文學淵源、社會主義關懷和實踐，和被政治批判間的因果關係、內在邏輯和歷史過程中的動態複雜性，不致僅以一句「政治化」（畢竟各階段的「政治化」的實際內涵都不一樣）概括帶過，需要更具體仔細地來疏理，也是我等臺灣知識份子，在面對大陸文學材料時應該建立的新的自覺。至於在其所受中國古典文學的教養上，高曉聲與陸文夫小時候看得最多的都是古典白話小說，高曉聲甚至還閱讀過《綱鑒易知錄》，他對於作家的歷史格局與視域擴大的敏感，對於複雜的三國人物曹操的認知，屢次出現在其創作觀中。而其口語白話的傳統，又是如何被歷史所生產與流變的？也都是可以用來綜合地分析，新中國「右派」作家的本土特色的一環。再加上或許是中國南方水土地域，所間接潛移默化等文化地理條件，可能陶冶了「探求者」作家群的感情與感性，諸如陸文夫的文人、名士氣質等，都使得「探求者」的文學特色，跟冷戰以降的中共黨史、歷史、政治、社會運動、古典與近現代思潮、文學傳承與流變間的關係，有可能建立出更為細緻的連繫。因此以文學史的視野，選擇「探求者」作家群及其作品為核心，重構新中國建國後的「右派」小說創作上的淵源、發展的一種關鍵面向，並動態地說明其文學困境的歷史起源與過程，應該能夠有一定的效度。

從文學本身的豐富性（自然包含內容與形式）來說，「探求